

20 世纪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构建*

尹蒙蒙

【提要】 作为反抗殖民统治中产生的民族史学,菲律宾史学家在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身份形成中尝试构建本民族的史学话语。在民族独立过程中,实现自我历史书写及传播民族主义成为菲律宾史学家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在独立国家建设时期,促进菲律宾民族认同和反映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史学话语构建的应有之义;在国家发展转型时期,彰显民族特色并寻求与世界历史对话成为史学话语构建的重要体现。纵观菲律宾史学话语的构建历程,一方面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其书写模式也随社会变化而不断演变;另一方面史学家对民族主义的传播、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重建、菲律宾与世界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史学发展潮流中,菲律宾史学基于自身使命感及文化自觉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特性,并尝试在世界历史中寻求自我定位。

【关键词】 菲律宾民族史学 民族主义 历史书写 史学话语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菲律宾很早便同中国建立了联系,双方在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中保持了友好关系。及至近代,菲律宾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亦未能幸免。随着 1521 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远征队到达菲律宾,菲律宾逐渐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菲律宾社会文化发展缓慢,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历史记载。菲律宾史学界关于菲律宾历史的产生发生过争论,如特奥多罗·阿贡西洛(Teodoro A. Agoncillo)认为菲律宾人在 1872 年前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西班牙宗教史学在当时史学界占主导地位;奥拉西奥·德·拉·科斯塔(Horacio de la Costa)、约翰·舒马赫(John Schumacher)等人则坚持把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史学发展作为菲律宾史学脉络的组成部分,^①菲律宾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与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和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菲律宾史学家也在反抗中逐渐构建起民族史学话语。

作为在反抗中产生并兴起的民族史学,菲律宾史学不仅承载了民族集体的共同记忆,还彰显了不同时期民族发展的特点及趋势。作为历史的主要书写者,菲律宾民族史学家始终以构建史学“自我历史”的话语为核心理念。这不仅包含菲律宾人争取书写自我历史的“历史话语权”的追求,还涉及运用民族主义话语书写历史的“史学话语权”的形成。^② 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构建不仅关乎其史学国际影响力,还涉及民族历史文化的书写和传承。这种民族史学话语,不仅体现了对西方史学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与菲律宾军事基地谈判研究(1953—1960)”(项目编号:23BSS039)的阶段性成果。

① Nicolas Zafra, “On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6, No. 4, 1958, pp. 454 - 460.

② 李剑鸣认为,历史学领域话语权牵涉“历史话语权”和“史学话语权”两个层面的问题。参见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

话语体系的反抗和对本民族精神的溯源,还折射出第三世界民族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本文通过分析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缘起和发展过程,揭示不同时期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演变,进而分析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构建的历史过程。

一、书写自我历史:菲律宾民族主义与早期民族史学话语构建(1946年前)

菲律宾社会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发展缓慢。19世纪以来,受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菲律宾人民的反抗斗争才逐渐由分散、局部的农民运动发展成有组织、目标明确的以资产阶级为主的联合斗争,并在19世纪中后期掀起高潮。1872年爆发的“甲米地”起义是菲律宾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西班牙当局的殖民统治,还促进了菲律宾民族意识的觉醒。此后的“宣传运动”(1880—1895年)更是拉开了菲律宾资产阶级救国的序幕,使菲律宾反抗斗争在1896年革命中达到高潮。在革命斗争影响下,为进一步激发民族意识,以何塞·黎刹(José Rizal)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意识到历史书写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尝试从书写和宣传层面提升菲律宾社会凝聚力。因而,早期菲律宾史学家以追求书写自我历史为目标,用革命斗争的书写模式展现民族主义者的反殖民斗争,并以唤醒菲律宾社会民族意识为己任。

(一)黎刹与菲律宾民族主义思潮

在19世纪中后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菲律宾国父”黎刹作为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核心人物,其革命活动对促进菲律宾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是早期菲律宾民族史学构建的主线。作为成长于现代政治环境中的人物,黎刹1861年出生于菲律宾内湖省卡兰巴镇,早年前往欧洲留学。在欧洲的经历促使黎刹产生一种“新生的、躁动的双重意识”,并形成了早期的民族主义萌芽。^①黎刹对民族主义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不许犯我》《贪婪的统治》《起义者》等多部小说中,通过故事讲述、人物描写等方式展现对外来殖民者的控诉和反抗,力图唤醒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黎刹还用自身行动践行其民族主义理念。1892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于1896年不幸被捕遇难。

尽管黎刹对西班牙统治者深恶痛绝,但对当时的西班牙政府仍抱有幻想,他“通过改革或在西班牙殖民政府允许范围内的革新以取得民族自治甚至独立”的政治主张,代表当时菲律宾大多数精英阶层和群体的看法,认为成功的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具有欺骗性”。^②但实际上,黎刹追求的理想革命状态是菲律宾全民的民族主义,而不仅是菲律宾精英期待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个菲律宾民族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③是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295页。

② José Rizal, *Manifesto to Certain Filipinos*, <https://www.thefilipinomind.com/2005/10/manifesto-to-certain-filipinos-by-jos.htm> [2022-11-4]

③ John N. Schumacher, S. J., “Rizal and Filipino Nationalism: A New Approach”,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8, No. 4, 2000, p. 550.

“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① 为追求统一的、全民的独立社会,黎刹通过宗教殉难的方式进行抗争,企图唤醒菲律宾民众的民族意识。

黎刹的杀身成仁改变了菲律宾的历史书写,使民族主义成为后来菲律宾政权“合法性”来源的依据。从史学发展角度而言,黎刹在当时已然意识到菲律宾史学的匮乏,同样也意识到菲律宾在世界史学中并无一隅之地,他呼吁菲律宾的史学书写必须以本民族为出发点,从民族视角撰写自身历史。^② 黎刹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对菲律宾历史进行反思,企图打破从国外记录来了解自己历史的可悲局面。他抨击殖民话语,对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的编年史《菲律宾群岛》重新注释,希望菲律宾民众能通过对本民族和历史的重新认知来获得自豪感。^③ 黎刹的史学书写特征主要是宣传、构建与反抗,他尝试通过对菲律宾古代史的勾勒和宣传,构建一个与西班牙不同的民族,并通过对西班牙殖民暴政的刻画来唤起菲律宾社会的民族意识,强化菲律宾人民内部的团结。

黎刹“自我”角度的书写,成为早期菲律宾史学家在史学领域进行民族革命的共同目标。这种“自我”的民族史学书写模式,奠定了20世纪菲律宾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作为菲律宾民族国家“第一人”,黎刹追求的“大马来人世界”也成为菲律宾独立后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理论来源和依据。^④ 黎刹“菲律宾民族”的史学意识及尝试,对早期菲律宾史学界构建史学话语产生了积极影响。

黎刹之后,菲律宾史学界产生了一批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试图从“自我”视角书写菲律宾历史,尝试形成自己的史学话语。以曼努埃尔·阿蒂加斯(Manuel Artigas)为代表的早期史学家,在讴歌菲律宾仁人志士和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历史做切割中拉开了菲律宾民族史学研究的序幕。阿蒂加斯活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菲律宾的政治、革命、社会文化等内容进行了考察,并为安东尼奥·卢纳(Antonio Luna)等一批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作传。^⑤ 阿蒂加斯结合时代潮流,一方面不断搜集菲律宾著名人物资料,对菲律宾民族精神及民族人物大加宣传,另一方面歌颂菲律宾民族独立,提倡改变历史书写模式,重视土著元素。何塞·克莱门特·苏卢埃塔(Jose Clemente Zulueta)是最早主张从菲律宾人视角重新撰写历史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参与菲律宾革命中意识到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呼吁以新的历史角度书写历史。^⑥ 阿蒂加斯和苏卢埃塔意识到民族独立离不开史学独立,而这必须改变原有殖民时期的史学书写模式,构建“菲律宾人的视角”。此外,埃法法尼奥·德·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96页。

② Floro Quibuyen, “Towards a Radical Rizal”,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6, No. 2, 1998, p. 152.

③ Ambeth R. Ocampo, “Rizal’s Morga and Views of Philippine Histor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6, No. 2, 1998, pp. 184–214.

④ 黎刹关于“大马来人”的构想和认知,参见 Rommel A. Curaming, “Rizal and the Rethinking of the Analytics of Malaynes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8, No. 3, 2017, pp. 325–337.

⑤ 参见 Manuel Artigas y Cuerva, *Antonio Luna y Novicio*, Imp. de La Vanguardia y Taliba, 1910; Manuel Artigas y Cuerva, *La Civilizacion Filipina*, Imp. Sevilla, 1912; Manuel Artigas y Cuerva, *Galeria De Filipinos Ilustres*, Imp. Casa Editora “RENACIMIENTO”, 1917.

⑥ 苏卢埃塔因生命短暂而未留下从新视角论述菲律宾历史的著作。特奥多罗·阿贡西洛认为,当时的革命史书写因受改革家幻想菲律宾成为西班牙一个省、不明确反西班牙、不相信暴力革命等影响,并不具备苏卢埃塔所期待的环境和条件。参见 Floro Quibuyen, “Towards a Radical Rizal”, p. 152.

洛斯·桑托斯(Epifanio de los Santos)作为一位“伟大的菲律宾学者”,^①整理了菲律宾文学和诗歌,并在革命时期筹办多种革命报纸,宣传革命意识和理念,以鼓舞菲律宾社会大众及推动民族意识启蒙。^②

反殖民的时代潮流及社会变革,为早期菲律宾史学研究者从自身反思历史走向及史学书写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开启了书写“菲律宾自身历史”的历程,民族主义也因此成为菲律宾史学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内容。尽管此时的史学很多时候呈现一种狭隘及不成熟的特点,但对民族主义者形象的塑造、对菲律宾历史的构建及对殖民统治的猛烈批判,成为菲律宾史学唤起民族意识的主要方式和使命。

(二) 从激进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到反美统治的曲折

美国通过战争征服菲律宾后着手建立殖民制度。从1901年菲律宾文治政府成立到1916年通过《琼斯法案》,殖民当局对菲律宾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造,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由于菲律宾社会的反抗,殖民当局因此注重菲律宾政府机关的“菲化”,注意吸收菲律宾人参与政治。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对菲经济的剥削和垄断,强调“美化”教育。美国殖民统治加剧了菲律宾社会的分化。菲律宾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转而进行政治斗争,试图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独立,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仍坚持革命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世界形势的影响,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并于1917年进入自治时期(1917—1941年)。在自治时期,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对独立的追求更为迫切,在斗争方式上也变得更为激进。这一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菲律宾共产党应运而生,资产阶级政党也呼吁成立菲律宾人自己的政府,美国被迫承诺菲律宾在独立前先行“自治”并于1935年组织全面投票。1935年11月,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曼努埃尔·路易斯·奎松(Manuel Luis Quezón)和塞尔吉奥·奥斯梅纳(Sergio Osmeña)分别担任自治政府的第一届正、副总统。奎松政府积极带领菲律宾向独立前进,并制定了发展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规划。然而,菲律宾并未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菲律宾最终沦为美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牺牲品,于1941年底遭到日本侵略而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42—1945年)。

纵观美国统治时期,与西班牙统治方式不同,美国殖民当局对菲律宾的“美化”政策及菲律宾资产阶级追求议会斗争的道路使民族斗争呈现新形势:菲律宾资产阶级奉行的上层议会斗争同小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民族革命的道路出现了割裂。美国殖民统治方式的改变、菲律宾自身以自治求独立的道路追求,一定程度上使菲律宾“正统史学”的书写缺少了对外来入侵的深刻批判,此时的菲律宾史学家更多表现出对未来的期待。史学界涌现以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Leandro Fernández)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注重民族史学的延续,并强化对菲律宾青年一代的教育,强调对未来历史的书写。

费尔南德斯专注从民族主义视角研究菲律宾历史,以民族进步、政治演变等内容为角度,渴望从历史中寻求菲律宾民族的发展动力。费尔南德斯在给菲律宾中学撰写的历史教材《菲律宾简史》一书中明确指出青年一代对职责的忠诚关乎国家福祉。在对菲律宾历史的溯源中,费尔南德斯只对大

① Ambeth R. Ocampo, “Who was Epifanio de los Santo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Jun. 29, 2018.

② Morilla Maria Norton, *Builders of a Natio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E. C. McCullough & Co., Inc., 1914.

众认知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展示,未对菲律宾史前史做过多考证。在书写范围上,费尔南德斯跨出本土范围,将菲律宾与西班牙关系、西班牙与欧洲国家关系也置于其中,凸显了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菲律宾对外开放的历史。费尔南德斯认为,美国的统治给菲律宾带来进步,且在菲律宾民族的反抗中,菲律宾人已削弱了美国的统治并控制了立法权,随着菲律宾政治的“菲化”,菲律宾未来充满希望。^①与早期史学家的反抗相比,费尔南德斯认为菲律宾革命至美国统治时已经结束,随着菲律宾共和国的建立,菲律宾国家前途可期。^②

与费尔南德斯不同,特奥多罗·卡拉夫(Teodoro Kalaw)和恩卡纳西翁·阿尔佐纳(Encarnación A. Alzona)从事专门史研究,更关注菲律宾现实政治和社会。卡拉夫专注政治科学研究,通过对菲律宾革命时期法律的考察,以宏大书写模式来宣传其民族主义、自由及民主理念,^③并尝试以完善的法制来促进菲律宾的民族繁荣。^④作为菲律宾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阿尔佐纳致力于菲律宾教育史、妇女史,并积极投身于菲律宾女性权利事业。她通过研究菲律宾妇女史,著书提倡性别平等,追求女性权利,^⑤成为史学界一名女权主义者。这种通过追求性别平等来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方式迎合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

美国统治时期的菲律宾历史书写,一方面延续了早期菲律宾史学书写风格,对民族构建和独立的追求仍是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基于史学家受美国教育及殖民统治的现实影响,其斗争态度有所妥协,更多地把自己视为“过渡的一代”,寄希望于菲律宾青年一代的成长并对其充满信心。曲折的斗争方式及“温和”态度的书写模式,极大地影响了菲律宾独立初期的史学书写。

整体而言,从西班牙殖民统治到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史学在艰辛中发展起来。由于教育落后及史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从19世纪80年代到1946年菲律宾独立前,菲律宾史学发展受到诸多限制。^⑥作为对革命历史的反映,菲律宾早期史学家很好地把民族意识融入历史书写当中。他们自觉肩负起民族身份认知的重任,把史学书写作为宣传民族独立精神和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途径,以及菲律宾历史溯源的重要方式。他们探讨了菲律宾历史的“独特性”,尝试从“自我”视角来书写菲律宾历史,为史学话语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彰显民族主义: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的快速发展 (1946—1970年)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在菲律宾建立傀儡政权并“宣布”菲律宾独立,强行改变菲律宾经

① Leandro Fernández,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Ginn and Company, 1919, pp. 291–307.

② Leandro Fernández, “The Philippine Republic”,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6.

③ Remigio E. Agpalo,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Dr. Maximo M. Kalaw”,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Vol. 16, No. 31–32, 1990, pp. 21–38.

④ Jorge Mojarro, “Teodoro M. Kalaw: Portrait of a nation-builder”, *The Manila Times*, Mar. 24, 2020.

⑤ Encarnación Alzona, *The Filipino Woman: He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1565–1933)*,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34.

⑥ Virginia A. Miralao, Joanne B. Agbisit, ed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Capacities,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2012, pp. 141–164.

济结构致使其经济崩溃,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不甘被蹂躏的菲律宾人民奋起反抗,最终在美军反攻下摧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光复后的菲律宾继续沦于美国的殖民统治,但在菲律宾人民的反抗下,美国不得不于1946年7月4日承认菲律宾政治独立。实际上,菲律宾并未取得真正独立,菲律宾当局在美国压力下与之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在两国“特殊关系”下继续控制菲律宾。因而,在独立初期,菲律宾当局一方面开启国家建设及民族独立身份构建的过程;另一方面依赖美国镇压国内民主革命运动,奉行“随美外交”并积极参与冷战。20世纪50年代,随着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菲律宾人民对美国的控制和掠夺愈发不满。1957年,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Garcia)总统上台执政后,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下开展经济改革运动,实行“菲人第一”的经济政策;1961年,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Diosdado Macapagal)上台执政,在反美民族主义运动中更改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外交上实现从“随美外交”到“回归亚洲”政策的转变,强化自身的亚洲身份;1965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上台执政,继续强化菲律宾的独特性。除进一步推动菲律宾民族经济的发展外,马科斯政府还在国际事务上迎合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深化与亚洲国家的交往。

在民族身份构建中,菲律宾政府对外强化菲律宾的“亚洲形象”,在强调亚洲身份的基础上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实现外交方针的转变;对内坚持民族身份塑造,本着“重建过去作为构建民族身份的一种途径”的理念,重视民族史学在凝聚社会目标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此期间,菲律宾史学呈现以“民族主义现象”为主的一系列特征,^①以去殖民主义态度构建民族国家身份,批判并重新审视菲律宾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成为了菲律宾史学界的潮流。

(一) 民族主义史学推动菲律宾民族构建

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菲律宾史学以对外寻求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方式开启新的书写模式。史学界涌现以尼古拉斯·萨弗拉(Nicolas Zafra)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以研究并宣传民族主义为己任,充分发挥史学在国家重建中的作用,并在推动菲律宾民族国家对外形象的塑造和认同中发挥积极影响。

萨弗拉作为战后菲律宾史学界领军人物,在充分挖掘菲律宾历史人物、重塑民族精神方面树立了典范。萨弗拉认为“一部充分而又令人满意的菲律宾历史关系到社会公众福祉”,^②并尝试通过研究菲律宾历史人物来增强社会的信心。在探索史学在国家重建中的作用时,萨弗拉尝试通过对菲律宾重要历史和人物的研究来探讨不一样的菲律宾历史,解读菲律宾重要历史人物,赞扬其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民族精神,并期望史学界能写出一部“充分而又令人满意的菲律宾历史”。^③

卡洛斯·基里诺(Carlos Quirino)作为活跃在菲律宾民族主义发展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其求学和政治经历一定程度折射了20世纪菲律宾史学家成长的共同特征。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基里诺一方面对菲律宾的文化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菲律宾的主要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进行分析。基里

① 本文中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参见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② Nicolas Zafra, “On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p. 454.

③ Nicolas Zafra, “On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p. 460.

诺通过对黎刹、奎松等政治人物的撰写,凸显了其对菲律宾民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关注,^①有助于从民族视角了解和认知当时的菲律宾政坛,凝聚了社会的向心力。

在对民族国家的国际形象的构建中,菲律宾史学家积极论证菲律宾国家身份在世界中的独特性,不断推动史学的国际化发展。加布里埃尔·法贝拉(Gabriel Fabella)作为马科斯总统的大学教师,最大贡献是从历史角度论证菲律宾的独立日是1898年6月12日,而非1946年7月4日。他以美国国家独立日为例,^②论证了原国家独立日的不合理性,并推动当时总统马卡帕加尔签署法令,将菲律宾独立日进行更改,因而获得了“6月12日独立日之父”之称。^③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史学家,法贝拉依靠历史知识的力量回应美国的殖民统治,从而促进本国民族主义进一步增强。格雷戈里奥·泽德(Gregorio F. Zaide)作为菲律宾独立后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积极致力于菲律宾史学研究及历史学术组织的发展,并成功把菲律宾史学研究推向联合国。同时,泽德还对菲律宾史学界以简单化态度撰写西班牙和美国对其殖民历史的现象给予批评,^④其著作是二战后菲律宾学生的学习教材,对菲律宾独立后一代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在后殖民时期^⑤的菲律宾史学书写模式构建中,阿贡西洛和雷纳托·康斯坦蒂诺(Renato Constantino)通过对历史革命事件的研究,勾勒了菲律宾作为新独立国家的历史轮廓,并在关于后殖民时期菲律宾史的书写模式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其观点塑造了后殖民时期的菲律宾人民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解,加深了菲律宾社会对历史人物的认知。^⑥

阿贡西洛因最早提倡菲律宾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义观点而闻名。在对菲律宾革命历史的研究中,阿贡西洛十分关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缺陷、菲律宾“群众”对民族独立的热情、上层菲律宾人的合作倾向,他对殖民主义视角的书写模式进行批判和抨击,^⑦突出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对菲律宾历史的书写中,阿贡西洛对菲律宾社会人民的主体作用进行了歌颂。几十年来,他的观点已被菲律宾学术界广泛接受,其多部著作成为菲律宾许多大学的标准教科书,对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斯坦蒂诺积极从历史中寻求菲律宾民族身份构建的解决方案,希望菲律宾人对过去有

① Carlos Quirino, *The Great Malayan: The Biography of Rizal*, Philippine Education Company, 1940; Carlos Quirino, *Magsaysay of the Philippines*, Ramon Magsaysay Memorial Society, 1964; Carlos Quirino, *Ama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Eulogio Rodriguez, Sr.*, New Day Publishers, 1983; Carlos Quirino, *Juan Luna*, Tahanan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1992; Carlos Quirino, *Manuel L. Quezon*, Tahanan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1995.

② 美国以费城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作为其独立日,而英国则在英美签订《巴黎和约》之日(1783年9月3日),承认美国独立。

③ Kristoffer R. Esquejo, “Gabriel F. Fabella: Talambuhay at Pamana ng Tinaguriang ‘Ama ng Hunyo 12’, 1898 – 1982”,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Review (in Filipino)*, Vol. 63, No. 2, 2011, pp. 55 – 88.

④ Ambeth R. Ocampo, “Not just Gomburza”, *Inquirer.net*, <https://opinion.inquirer.net/82663/not-just-gomburza> [2022-11-19]

⑤ 二战后,随着亚非一些国家陆续独立,这些国家进入后殖民时期。就菲律宾而言,随着1946年取得国家独立,菲律宾开始进入后殖民时期。参见 Dana R. Herrera, “The Philippines: An Overview of the Colonial Era”, *Education About ASIA*, Vol. 20, No. 1, 2015, p. 18。

⑥ Floro Quibuyen, “Towards a Radical Rizal”, p. 151.

⑦ 雷纳尔多·伊莱托(Reynaldo C. Ileto)认为阿贡西洛对“殖民主义视角”的史学书写模式批判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二战时期日本的影响,参见 Reynaldo C. Ileto, “Reflections on Agoncillo’s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2011, p. 497。

一个“有用”的记忆,以此推动菲律宾人民对真正建国的追求。^①他大胆揭示并批判西班牙和美国统治者对菲律宾实行的殖民政策,凸显菲律宾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史实,推动了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编撰的进步。

从 1956 年阿贡西洛的《群众起义》到 1970 年康斯坦蒂诺的《重温过去》,民族主义史学家对过去 20 年来激进的、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革命读物进行了整合和普及。^②该时期的菲律宾民族史学开始更多关注菲律宾社会人民的作用,并在国际社会呈现出一种激进昂扬的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菲律宾的国家身份构建,为民族主义精神的凝聚和国家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并对菲律宾政府政策转型提供了现实帮助。

(二) 宗教研究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融合

20 世纪 50 年代后,受社会改革影响,菲律宾史学界对殖民时代的重新评价及如何看待宗教作用的争论日益激烈,呈现将宗教研究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趋势。

作为公认菲律宾和亚洲文化与历史领域的权威,科斯塔从菲律宾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视角出发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辩护”,指出西班牙殖民者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具有了“找到某种方式让本地人进行工作,同时又不侵犯他作为男人的权利”的意识,在当时而言,“西班牙似乎是唯一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担心这个问题的殖民大国”。^③同时,科斯塔通过对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社会转型、经贸、传教士等问题的分析,一定程度肯定了西班牙殖民的客观影响,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并非像某些人说的“暴虐的怪物”。^④此外,科斯塔还从教育领域论述了西班牙耶稣会对菲律宾教育的积极影响,指出 1581 年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马尼拉后,就积极推动当地耶稣会教育发展,从促成耶稣会学院的建设,到制定教学制度、发展高等教育等行为,促使马尼拉成为东南亚地区较早出现高等教育的城市,同时也使菲律宾的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为未来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⑤

科斯塔肯定宗教的立场得到了不少史学家响应。菲籍美裔史学家约翰·舒马赫对菲律宾革命抱有深深同情。在对菲律宾教会的研究中,舒马赫打破史学突出菲律宾“世俗化”革命的传统模式,^⑥将教会作为菲律宾社会和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部分,考察神职人员在革命中的作用。舒马赫认为,在所谓“世俗化”研究的概念中,随着革命和共和国的到来,大多数菲律宾人并未简单放弃对罗马教会的忠诚,随着“卡蒂普南”起义和大量修士的入狱和离开,菲律宾神父迅速填补了真空,真正代表

① Roland G. Simbulan, “Renato Constantino: The Centennial Filipino Scholar, 1919 – 199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0, No. 3, 2000, p. 405.

② Reynaldo C. Ileto, Vicente L. Rafael, Coeli Barry, Francis A. Gealogo Chair, Maricor M. Baytion, Filomeno V. Aguilar Jr., “Rev. John N. Schumacher SJ, 1927 – 2014”, *Philippine Studies: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Viewpoints*, Vol. 62, No. 2, 2014, p. 299.

③ Horacio de la Costa, “The Legal Basis of Spanish Imperial Sovereignt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 No. 2, 1953, p. 156.

④ Brendan Luyt, “The Early Years of *Philippine Studies*, 1953 to 196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2, 2019, p. 219.

⑤ Horacio de la Costa, “Jesuit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o 1768”,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 No. 2, 1956, pp. 127 – 155.

⑥ 阿贡西洛、康斯坦蒂诺等革命史学者会有意地边缘化教会神职人员在革命中的作用,突出菲律宾革命“世俗化”,这也是菲律宾革命史学的特点之一。

了当时群众的情绪和立场。^①舒马赫从菲律宾人信仰坚守及神父积极作为的角度,肯定了西班牙统治时期宗教的社会影响。

保罗·杜默尔(Paul Dumol)与舒马赫持有类似立场。他认为西班牙传教士把基督教引入菲律宾后改变了菲律宾人的生活,^②打破了菲律宾之前一直盛行的各种关系,尤其在性别关系塑造、城市社区形成等方面,基督教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杜默尔具有亲殖民主义立场,但他歌颂菲律宾文化和历史,以及菲律宾民族主义和反抗殖民主义的精神,更毫不吝啬称赞黎刹是“哲学的坚定崇拜者”,“毫不怀疑他掌握着解开历史意义的钥匙”。^③杜默尔把“亲殖民”和弘扬民族主义与文化作为并行发展的模式,一定程度显示了后殖民时期菲律宾史学界对殖民历史反思和再研究的某种趋势。

此外,以研究殖民前菲律宾史和西班牙殖民史而著称的归化史学家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鉴于菲律宾被殖民史研究资料的匮乏,在史料上积极肯定了西班牙统治时期的作用,对阿贡西洛“谨慎对待西班牙史料”观点进行批判,提倡以更广泛的史料来源研究菲律宾历史。^④在史料来源和运用方面,萨弗拉也对阿贡西洛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按照阿贡西洛教授的原则来书写菲律宾历史,即对西班牙史料进行严格筛选和抛弃,那么将完全体现不出菲律宾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任何作用”。^⑤

从历史的沿承角度而言,宗教史学者尝试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殖民主义再反思,期望从宗教文化传承角度拓展菲律宾历史的起源,这一定程度体现了菲律宾史学家在构建民族国家身份时亟须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的现实需要。

在如何看待菲律宾与西方国家关系及菲律宾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时,奥诺弗雷·科尔普斯(Onofre Corpuz)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科尔普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时期菲律宾高涨的民族主义正经历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转变,此时的社会思想已从思想家批判性和原创性的词汇转移到大众讨论的话语,民族主义在菲律宾政治中的胜利,明显地表现在对政治党派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的忠实和敏锐的解释者”的行为进行抨击。^⑥因而,他呼吁菲律宾历史学者有责任在研究中秉承客观标准,通过自我民族书写来建设菲律宾对外交流的桥梁。^⑦

与独立前相比,菲律宾独立初期的史学界基本实现了长期以来书写“自我”历史的夙愿。受国家建设目标及国际形势的影响,独立后的菲律宾民族史学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

① Reynaldo C. Ileto, Vicente L. Rafael, Coeli Barry, Francis A. Gealogo Chair, Maricor M. Baytion, Filomeno V. Aguilar Jr., “Rev. John N. Schumacher SJ, 1927–2014”, p. 299.

② CNN Philippines Staff, “How Christianity shaped the Filipino family culture”, *CNN Philippines*, Apr. 8, 2021.

③ Paul A. Dumol,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Rizal’s *Filibusterismo*”, *Budhi: A Journal of Ideas and Culture*, Vol. 8, No. 1–2, 2004, p. 285.

④ 阿贡西洛从菲律宾历史自身书写的角度出发,指出需要谨慎对待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文献,认为“殖民政府垄断了史料来源,对这种史料的利用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菲律宾人民史”。参见 William Henry Scott, “Cracks in the Parchment Curtain”, *Philippine Studies*, Vol. 26, No. 1–2, 1978, p. 174.

⑤ Nicolas Zafra, “On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p. 457.

⑥ Onofre Dizon Corpuz, “Western Colonisation and the Filipino Respons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3, No. 1, 1962, p. 1.

⑦ Onofre Dizon Corpuz, “Western Colonisation and the Filipino Response”, pp. 22–23.

定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菲律宾国家独特的民族主义与彻底的反帝、自由、独立思想有很大不同,相关史学研究领域也由此出现了很大漏洞;^①而且,此时的民族主义在史学中的主要任务是为菲律宾的民族未来寻求方向,并在实际政治中成为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当然,该时期的史学界也呈现后殖民时期的共性特征,即在反思和重新审视殖民的影响、探讨如何对待与宗主国关系中走向多元化。

三、倡导民族特色:菲律宾史学研究多样化与世界历史的互动(1970 年以后)

20 世纪 70 年代后,马科斯政府建立独裁统治,并以“军管法”为手段尝试建设一个“新社会”,试图通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等改革建立以“马科斯个人为核心,军人、技术官僚、外国资本三位一体新的宪政集权体制”。^②在思想文化方面,马科斯政权一方面通过大力宣传其“新社会”纲领为菲律宾人民描绘“美好图景”,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强化对菲律宾历史的编撰提升菲律宾人民自豪感,为其独裁统治塑造合法性。马科斯政权的独裁统治引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反对。1986 年,随着“人民力量”革命的发生,马科斯政权倒台,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接任总统,菲律宾政治恢复民主自由制。社会管制突然宽松,政坛不稳定现象也随之出现,菲律宾面临很多政治、社会问题。90 年代后,随着政局稳定,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也逐渐恢复并走向正轨。同时,受国际局势与国内政治变化影响,菲律宾对外政策也发生了转变,把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作为一个重点,菲律宾外交多样化成为一种趋势。

因此,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政治变化影响,菲律宾史学界一度形成两种鲜明的模式,即马科斯政府主导下的菲律宾修史工程,以及民间史学推动下的以研究地方史为特征的模式。^③1972 年 9 月 21 日,马科斯总统签署文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为进一步取得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权,马科斯政府开启了一项名为“命定计划”(Tadhana Project)的修史工程。该工程由马科斯政府发起,邀请一批史学工作者参与,规划撰写一部 21 卷的菲律宾史,力图展现从地质时代到 1970 年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范围内“真正的菲律宾民族”,在精神上发掘“真正的菲律宾人”。该项修史工程雄心勃勃,并于 1973 年至 1974 年在争议中启动。同时,参与该工程的史学工作者也遭到史学界的非议和攻击。^④

马科斯政府启动此项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其统治的合法性,把“军管法”的实施作为菲律宾民族发展过程中自然或合乎逻辑的结论,以“命定计划”命名更凸显其迫切希望菲律宾民众看到其治下

① 受菲美“特殊关系”的影响,菲律宾史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 1896 年反抗西班牙人的菲律宾革命和西班牙征服者到来前的菲律宾历史,对其他时间段的历史则关注较少。参见 John Carroll, “Contemporary Philippine Historians and Philippine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2, No. 2, 1961, p. 23.

② 吴小安:《试论马科斯“新社会”纲领》,《南洋问题研究》1992 年第 1 期。

③ 1976 年,小马塞利诺·福龙达(Marcelino A. Foronda, Jr.)担任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主席,开始推动学会向菲律宾地方史、社会史研究转向。参见 Marcelino A. Foronda, Jr., “Regional Culture As Part of Philippine National Culture”, *Transaction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15, No. 55-62, 1993, pp. 55-62.

④ Berber Bevernage,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237.

的“和平、繁荣以及民族自豪”。^①“命定计划”体现出马科斯独裁政权企图利用历史塑造统治合法性的迫切。在马科斯政府给参与学者注入大量资金、资料等资源后,该工程进行了十多年之久,直至1986年2月“人民力量”革命爆发才被迫中断。浩大的修史工程最终完成了规划中的四卷整本和具有删节性的两卷。通过编撰框架来看,这项工程以一种综合和创新的解释视角来书写菲律宾历史,突出了菲律宾民族和政体的本土起源,强调了菲律宾“南岛西亚和马来—波利尼西亚”根源,并将西班牙和美国统治下的殖民时期描述为外来文化对菲律宾根深蒂固的文化历史发展模式的暂时破坏,其博学、连贯的概念和新颖的解释方法,展现了提升菲律宾文化的有意尝试,被隆美尔·库拉明(Rommel A. Curaming)认为是“一种杰出的非殖民化史学”。^②尽管“命定计划”是马科斯为实现自我目标而推动的一项官方修史工程,但其撰写视角无疑受当时“去殖民化”思潮影响,实现了官方史学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此外,具有“菲律宾新史学之父”之称的祖斯·萨拉查(Zeus A. Salazar),以“自我视角”进行历史研究,主张用菲律宾语写作,并在担任菲律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期间要求学院内所有正式交往要使用菲律宾语,由此开启了一场知识分子世界的社会科学运动。^③萨拉查以要求语言本土化的方式积极构建独特的菲律宾史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马科斯时代”书写菲律宾民族独特性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菲律宾与美国“分手”之际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

与政府主导的官方修史相比,在欧美国家史学研究转型的影响下,^④菲律宾民间史学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主要体现为研究领域更广泛、研究视角更新颖、研究视野更开阔。受民族国家构建历程、菲美关系、出国经历、兴趣爱好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年轻的历史学者对菲律宾历史的研究出现了“集体转向”,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社会下层”,尝试从农民革命、“下层”对殖民地的反抗等视角解读历史。^⑤以雷纳尔多·伊莱托、朗伯斯·奥坎波(Ambeth R. Ocampo)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史学工作者,把菲律宾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作为去殖民化研究的专家,伊莱托以菲律宾革命为主要研究对象,十分关注人民大众在早期革命中的反应,尝试从新视角反映早期革命。伊莱托指出,菲律宾史学界“精英”史学的解释框架总体保持不变,这种“重视菲律宾神父和知识分子思想及活动”的框架为“群众诉求”提供了论述形式。^⑥伊莱托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精英人物思想和行动转移到底层人民的观念及革命参与,关注整个国家变化及社会演变,^⑦这种研究视角的转移为新论述框架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奥坎波主要关注菲律宾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在对黎刹、马比尼等民族主义者的研究中,他努力打破时代束缚,呈现真实人

① Berber Bevernage,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p. 240.

② Berber Bevernage,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p. 244.

③ Ramon Guillermo, “Exposition, Critique and New Directions for Pantayong Pananaw”, <https://kyotoreview.org/issue-3-nations-and-stories/exposition-critique-and-new-directions-for-pantayong-pananaw/> [2022-11-19]

④ 刘宏:《菲律宾社会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3期。

⑤ Milagros Guerrero, “Review: Understanding Philippin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29, No. 2, 1981, p. 240.

⑥ Reynaldo C. Ileto,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

⑦ Joseph Scalice, “Reynaldo Ileto’s Pasyon and Revolution Revisited, a Critique”,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1, 2018, p. 29.

物形象并赋予真实情感,力图还原更具生活气息的历史人物。奥坎波以菲律宾民族国家身份的构建为主要目标,认为菲律宾民族身份“在人民斗争解放中实现”的进程仍是一种“未完成的革命”。^①同时,奥坎波还对外交关系史有所关注,力图塑造菲律宾历史人物与西方和亚洲邻国的密切联系,从而提高公众的国际意识和对世界的敏感性。作为新生代史学家,奥坎波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菲律宾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性”。

此外,菲律宾民族史学还积极与世界历史进行对话互动,并从对外交流中彰显菲律宾史学的独特性。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菲律宾外交政策开始“亚洲转向”,史学界很快做出反应,侧重于菲律宾与亚洲国家关系研究,以期为国家决策提供服务。以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②前负责人及菲日关系专家约瑟法·萨尼尔(Josefa Sanial)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史学者,把区域研究和民族构建相结合,^③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把历史学科建设、区域研究人才培养、菲律宾对外关系系统一起来,为菲律宾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帮助。

从全球视角审视菲律宾历史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成为菲律宾史学界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将 1896 年革命以“受难记”宗教语言的形式进行表达,以及关注社会精英和底层人民间的较量,成为“1896 年革命”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与英国史学家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在其著作《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中从帝国竞争、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考察美国和菲律宾民族主义精英崛起的视角不同,^④伊莱托从文化侵略角度对之回应,指出美军进入菲律宾的本质是为“新教传教士和牧师铺平道路”,因而“菲律宾革命”的含义必须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和西班牙—菲律宾天主教间的冲突,这是菲美战争的核心。^⑤从对菲律宾革命最初的历史论述,到对美、西、菲社会上层精英间的互动研究,再到将之置于全球背景下的宏大视野探讨,菲律宾史学家在借鉴国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展现菲律宾自身视角。革命史的研究贯穿于菲律宾建国后的史学研究,并未呈现衰减迹象,这或许与其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及国家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 世纪 70 年代后,菲律宾史学在充分肯定传统史学书写的基础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受现实政治和菲美关系变化的影响,菲律宾史学缺少对国家与世界关系的理性思考,一度在整体上呈现一种“自我讴歌”的状态;除对本国历史文化的发掘外,也未全面审视菲美关系及其对菲律宾民族史学的影响。正如伊莱托所言,也许菲律宾的学术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宗教、世俗和其他传统二分法这种不加批判的观点进行指责的阶段。^⑥

① Reynaldo C. Ileto,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Philippine Political Discours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1, 1993, pp. 62 – 82.

② 亚洲中心由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政府 1955 年设立的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发展而来,1968 年更名为亚洲中心,其目标是在学习和研究领域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密切广泛的联系,通过对亚洲文化、历史、社会等深入研究和了解,构建菲律宾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认同。

③ Janus Nolasco, Danae Pantano, “Area Studies in a Time of Nationalism: Dr. Josefa Sanial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1960s”,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sia*, Vol. 54, No. 1 – 2, 2018, pp. 3 – 25.

④ A. G. Hopkins,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⑤ Reynaldo C. Ileto, “The Road to 1898: On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9, No. 3, 2021, pp. 522 – 523.

⑥ Reynaldo Ileto, “Critical Issues in ‘Understanding Philippin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30, No. 1, 1982, p. 98.

四、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特征

纵观菲律宾史学的起源、发展及构建话语的历程,可以看出其发展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从反抗殖民统治到争取国家实现真正独立和自由,菲律宾民族一直在抗争和追求中成长。菲律宾史学家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下,从倡导书写自我历史,到彰显民族主义史学,再到体现民族特色并积极寻求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尝试构建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史学话语。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史学家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内在动力,不断塑造民族认同,并向世界展现菲律宾历史书写的自觉性。

首先,菲律宾学者构建历史话语的前提是对西班牙学者书写的菲律宾历史的否定。鉴于革命时期反抗殖民者的需要,菲律宾史学家单纯以民族主义视角来书写历史,此时的菲律宾史学尚未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菲律宾独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建设,菲律宾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历史起源的辩论,其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西班牙视角下的菲律宾历史。此时的史学界既有“西班牙统治时期文献无法写出真正菲律宾历史”的迷茫,也有“西班牙统治是菲律宾历史一部分”的反思。这体现了菲律宾史学在后殖民时期对自我历史的认知。随着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菲律宾史学家对历史的认知和书写进入新阶段,以一种更为悠久的历史观展现历史的独特性。从菲律宾史学的产生到提出以“自我视角”书写历史,再到独立后史学的快速发展及多元化的呈现,“革命”“民族”贯穿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但书写自我历史一直是菲律宾史学家的坚守。

其次,菲律宾史学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内在动力,积极推动民族主义的传播。菲律宾民族主义基于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是菲律宾社会各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的事物。^①作为民族主义在史学界反对殖民主义的方式和潜在的解放运动,^②菲律宾史学把“提倡自我”和反殖民主义作为书写中心。在民族主义主导的史学发展中,研究课题相对集中于菲律宾国家历史文化、英雄人物、政府政治等领域。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指出,历史可以退化为对想象中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或激发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以彻底抹掉过去;它可以通过揭露令人不快的真相,迫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的社会。^③在菲律宾史学界,史学家们正是通过“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发掘”民族英雄的人物形象,自觉承担起传播民族主义的重担,并从历史缘起中寻求反抗殖民统治的合法依据。他们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通过教育传承下去,尤其是对民族主义历史教科书的撰写和运用,不仅塑造了菲律宾的共同记忆和情感,还提供了营造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与形式。

再次,史学话语的构建推动了菲律宾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进程。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

① Armin Von Bogdandy, Rüdiger Wolfrum, eds.,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Vol. 9,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p. 622.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③ Eric Foner, *Who Owns History? 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Changing World*, Hill and Wang, 2002, p. 87.

(Richard J. Ewans)曾说:“历史的目的不再被视为某些抽象的哲学学说或原则提供范例,而是单纯地将过去视为值得珍惜和保存的东西,作为真正理解和认可当前国家和社会机构唯一合理的基础。”^①在唤醒民族主义的目标下,菲律宾史学界将个人身份认同的来源定位于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被视为主权的承载者、忠诚的核心和集体团结的基础。^② 史学研究通过对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的公众人物历史形象的塑造,形成国家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从而对社会个人生活和思维方式形成决定影响,^③同时也形成了对菲律宾政府“合法性”的历史阐释。随着菲律宾独立,菲律宾政府将促进民族身份构建、提高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不断提倡利用历史推动国家重建,这使史学界对历史的解释变得有意义且政治化。^④ 菲律宾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定也变成一种共识,并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独特性认可的思维方式。这种史学追求不仅促进了本民族的内部团结,还进一步推动了菲律宾对外尤其是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处理本国与对外关系时,菲律宾史学界与政府决策间形成的良性互动,促使菲律宾国家在继承身份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身份。^⑤

最后,菲律宾史学书写模式的不断演变及史学在不同领域的相互争论,从文化视角拓展了菲律宾历史的外延。在菲律宾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影响下,民族史学体系经历了“自我书写”到“民族主义”再到“民族特色”的三个阶段,并在每个转型时期不断拓展相关历史研究。第一,史学书写模式的转型拉长了菲律宾民族的历史,从最初的菲律宾革命,到认为菲律宾人由麦哲伦发现,再到探索菲律宾最早的地质时代,菲律宾史前史源头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不断被追溯。第二,史学模式转型丰富着菲律宾历史内涵。从最初基于现实为民族主义者作传,到挖掘菲律宾民族历史资源和拓展本国与外国的关系,再到强调公众史叙事,^⑥菲律宾史学内涵在丰富中强化。第三,菲律宾新生代史学家尝试扩展史学书写视角,将史学置于更宏大的视野中,以期塑造菲律宾历史在全球历史中的独特性,从而加强自身民族国家在世界中的身份构建和认同。

此外,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构建还从世界文明史中进行自觉定位。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处理好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即“把自身文明置于世界各文明中的何种位置来书写”。^⑦ 对革命年代的认识成为菲律宾人民的集体记忆,对革命史学的撰写形成了菲律宾社会的集体认知,共同构成了社会内部自我更替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推动菲律宾史学在世界历史书写中寻找自我。自菲律宾史学诞生伊始,几代史学家的使命是写出一部富于菲律宾本色的“自我历史”,并力图凸显在国际上的史学话语权。从最初的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史学,再到官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的发展,随着世界历史书写多样化局面的出现,菲律宾历史书写不断追求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特色”。此时的

① Richard J. Ew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p. 14.

②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

③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s Horn: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Vintage, 1998, p. 169.

④ Muzaffar Suleymanov, “The Role of History in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Case Studies”, *Peace & Conflict Review*, Vol. 1, No. 1, 2008, p. 7.

⑤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s Horn: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p. 167.

⑥ Michael “Xiao” Chua, “Public history is Important too!”,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2/07/12/opinion/columns/public-history-is-important-too/1850622> [2022-11-3]

⑦ 刘文明:《文化自觉与世界文明史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自我特色”与最初的“自我书写”已有所不同,此时的“自我”内容更为丰富,对菲律宾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知视野也变得更为宏大,并在国际对话中试图展现菲律宾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性,尝试在世界历史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菲律宾史学还无法做到在各领域与世界历史对话,但作为具有第三世界国家一般特征的民族史学,菲律宾史学在与世界文明史的交流中展现了明显的自觉性,并不断追求实现自我定位。

结 语

脱胎于追求民族独立的菲律宾史学,在其民族真正独立后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其话语的构建也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愈加明显。从最初提出用菲律宾视角来书写其民族历史到官方史学的修订,从反抗殖民统治和外来侵略的历史书写到革命史学的书写,菲律宾史学主流书写模式依旧保持了反抗压迫、追求民族自由的原本风貌,这为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构建奠定了基调。作为亚非拉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具有民族国家发展的一般特征。

21 世纪,全球史观念与方法在史学理论界逐渐被广泛讨论,^①菲律宾史学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掘呈现更深入和细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将社会文化凸显于全球视野中的努力也更为明显。当然,菲律宾民族史学话语的构建仍存在诸多局限:革命史学书写形成的传统及民族主义史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菲律宾官方主导下的史学研究盛行,其本身存在着历史被篡改的危险。^② 无论早期史学界对民族英雄人物的推崇,还是重建时期菲律宾政府与史学组织的密切相连,史学界“自上而下”地讨论菲律宾政府、国家与英雄,“自下而上”探讨菲律宾“人民”的作用,都围绕着菲律宾“自我视角”的历史书写目标,共同形成了历史研究的坚守和自觉性。显然,只有从宏大视角出发,打破政治束缚和国家间“特殊关系”的影响,才能更全面地展现菲律宾史学,写出一部史学家期待的全球视野中的菲律宾历史。

(作者尹蒙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241002)

(责任编辑:崔 瑾)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张云:《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 Cesar Ramirez, “Forgetting Ferdinand Marcos: The Dangers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https://www.mironline.ca/forgetting-ferdinand-marcos-the-dangers-of-historical-revisionism/> [2022-11-03]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generality of world history and adjuste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his process had, in turn, promoted the adjustment and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rchives and the Scientific Turn in Narratives of Charles VII in French Historiography // Gao Yu

In the study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cholars commonly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nke School promote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rench academia. But this assumption overlooks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academic groups.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anke School was introduced into France, archivists and Romantic historical writers, represented by Henri Martin, launched a major debate over the authenticity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King Charles VII of France. These archivists opposed the Romantic writers for their overly subjective and demeaning narrative of Charles VII and attempted to evaluate Charles VII impartially and objectively through collating first-hand materials, writing monographs, and other ways. The archivists had left behind many materials such as book reviews, monographs and others, which clearly reflect their academic pursuit of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cas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ankean historians, archivists also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scientific tur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Yin Mengmeng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Philippines emerged from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olonial rule. Filipino historians have been trying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f their national history in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process, it has become Filipino historians'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nation and spread nationalism. In the post-independent era, it was instrumental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rticulating the trajectory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t was adopted to highligh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eek a dialogue with world-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Filipino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n the one h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society, whose evolving mode of writing mirrors the social changes within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ting nationalism, cultiva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while facilitating a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as maintained its unique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driven by its own sense of miss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strives to define its own niche within world historiography.